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跨世纪知识城——

旷古之谜

 **eBOOK**
网络资料 非卖品

摩亨佐·达罗毁灭之谜

20世纪初，一个振奋人心的考古发现，解开了长期以来历史学家为之争论不休的一个科学课题——谁是印度古代文明的主人。随着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古城的发现和发掘，迷雾终于拨开，历史以其无可辩驳的真实，向世界宣布：是黑色皮肤的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印度古代灿烂的文明，而不是入侵的雅利安人。印度河流域无愧是世界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辉煌的哈拉帕文化

这两座古城遗址连同此后在印度河流域陆续发现的其他古代城市文化遗址，分布在东西约 1500 公里，南北约 1100 公里的广袤地区，历史学家将它们称之为哈拉帕文化。这些古城中又以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两城规模最为宏大。

从遗址的发掘中，人们惊异地看到了古代达罗毗荼人非凡的创造历史的伟力。

这两座古城的建筑形制大致相同，周长均在 3 英里以上。其中摩亨佐·达罗占地达 260 公顷，由卫城和下城两部分组成。卫城四周建有高耸的塔楼。城内有大浴池、大粮仓、宽敞的会议厅以及其他许多公共建筑。除此以外，古城还有宽阔的大道、合理配置的小巷、完整的排水系统和精致的汲水井等。这些都显示了古达罗毗荼人建造城市时的周密设计和高度的技术水平。

遗存在城里的还有各种农业生产器具和手工业工具：农产品有棉花、麦类、椰枣、瓜果；家畜家禽已广为驯养，品种有水牛、绵羊、骆驼、狗、马、鸡等；工业品有素陶、彩陶、纱、布、青铜器皿；最引人注目的是遗物中还发现有刻有犀牛的印章以及大量的石制法码。从对比中，我们知道当时达罗毗荼人已掌握了十进位制的计算规则，重量的基本单位是 0.86 公斤。一具用贝壳制成的尺子的碎片上镌有精密的刻度；城里还发现有船只，这使人们相信，当时在农业和手工业相当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已经发达起来。许多商人聚集在城里经营商业，并且跟海外发生了贸易往来。

出土的文物中，还有大量造型精美的艺术品，如小雕像、骨刻、绘画等，其中护身符印章尤多，达 2000 余枚。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印章上的动物形象和文字符号，据统计将近有 400 个左右，有人形、鱼形、脚形、桌形等，虽迄今未能准确辨认，但人们却有理由判断，当时的文化艺术水平已经达到很高的程度。

总之，古代的摩亨佐·达罗是一座繁荣美丽的城市。同时也说明在公元前 2500 年左右，印度次大陆地区已经进入了早期的国家阶段。这座城市也许是当时统治者的都城。

摩亨佐·达罗的突然毁灭

虽然摩亨佐·达罗的繁荣经历了漫长的几个世纪，然而，在历史学家的眼里，也只能是一瞬间的过眼烟云。到了公元前 18 世纪中叶，哈拉帕文化突然衰落了，印度河流域很多地方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尤以摩亨佐·达罗为

甚。发掘中除燃烧的残迹外，街头巷尾，到处都是男女老少的尸骨，整座城市变成了一片废墟，人们称之为“死亡的山岨”。

摩亨佐·达罗是怎样毁灭的呢？这又成了考古学家探测的重要课题。

有人设想是由于城市内部发生剧烈的变革和斗争的结果。但是这种设想似乎缺少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又有人认为雅利安人的入侵是导致这一毁灭过程的基本原因。虽然这种观点找到了考古文献的佐证，如俾路支诸部落、临近伊朗的诸部落、或与印度河流域文明相近的周边各部落，很可能都先后参与了这一过程。考古资料证明，他们确实入侵过这一地区的。然而，究竟是哪个部落首先进入这一地区的？谁是这种“英雄行为”的创造者呢？无论从史实还是从有关参与这一过程的部落神话或传说中，都找不到哪怕是一鳞半爪的资料。

通过科学家长期的探索与研究，这个历史之谜终于解开了。原来它是被一场特大的爆炸和大火毁灭的。巨大的爆炸力不仅使古城半径 1 公里内所有建筑物被摧毁，而且使走在街上和呆在家里的人和动物，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杀戮。原来是自然灾害摧毁了这座繁荣而美丽的古代城市。

科学家证实，这种巨大的爆炸力来源于大气中电磁场和宇宙射线的双重作用。空气中非常活跃的化学微粒，导致气溶胶的产生，并迅速积聚占据了广阔的空间，形成大小不等的球体。这种物理化学性球体有的被称之为“冷球”，这是一种未曾燃烧起来的色暗不透明的“黑色闪电”；有的是一种“发亮”的球体，呈柠檬黄色或亮白色。

上述现象，自古至今，多有出现。古埃及新王国时期法老图特摩斯三世时的编年史中就有关于在 22 年冬季的第 3 个月的一个早晨，空中曾出现一团明亮的火球的记载。古希腊罗马人也曾多次描述过这种现象。

大气中形成的大小不等的黑色或白色球体，能产生剧毒物质，使空气迅速毒化。摩亨佐·达罗的居民，大概是受到有毒空气的威胁后，紧接着又经历了剧烈的爆炸，使他们连同其创造的文明同归于尽的。

古印度的长篇叙事史诗《摩诃婆罗多》曾隐约地提到了摩亨佐·达罗文明被毁一事。诗中描述了“天雷”和“无烟的大火”，“惊天动地的爆炸”，以及高温使河水沸腾、游鱼煮熟的悲惨景象。

科学总算暂时解开了这一历史的千古之谜。但是，还有新的解释吗？科学的探索是没有止境的，我们画下的只是一个暂时的句号。

耶稣的传说及其人神之争

哪一天是圣诞节

从古至今，所有信奉基督教的民族和人们都以十分隆重的方式，庆祝一个古老而富有传奇色彩的节日——圣诞节，即耶稣的诞生纪念日。这一天，人们聚集在被装饰得熠熠生辉的圣诞树下，尽情欢笑，载歌载舞，接受圣诞老人的祝福，孩子们还会得到一份长辈们精心准备的圣诞礼物。

耶稣是基督教徒们崇拜的偶像。据说，现在世界各国通用的“公元”，是耶稣的降生年，也是新纪元的开始。然而历史学家对于他的确切出生年月众说纷坛，莫衷一是。说耶稣生于公元元年，是6世纪时的一位罗马教士所倡导的，直至10世纪才为各国公认。后来，经人推算，断定他所指年份不甚准确，说是少了4年，耶稣应当生于公元前4年，即中国汉哀帝建平三年。但也有人认为耶稣的出生年月尚在其前1年或3年。总之，现在的公历纪元与耶稣的生卒年不符合，却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只是现在已相沿成习，无法也不必改动了。至于耶稣出生的具体日期，更是无从考察。有的民族定为1月7日，也有的民族定为2月2日、3月25日、4月19日、5月20日、11月17日、12月25日等等。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基督教徒们都按照自己的传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举行各具特色的庆祝活动。至于现今各国通行的以12月25日作为圣诞日，大约始于公元4世纪，这只是基督教徒们移用农业上的一个节气，来开展纪念耶稣的活动罢了。从《新约》中记载的有关耶稣降生时的环境与景象看，耶稣诞生的时间，似乎不在一个寒冷的冬天，而是在一个和煦的春天或初夏。不过，现行的圣诞节，已成为西方人最大、最隆重、最快乐的节日。人们习以为常，也不必深究其所以然了。

耶稣诞生的传说

尽管耶稣诞生的年份众说不一，但总的看来，如果耶稣确是一个活生生的凡人，那至多也不过相差4年或7年。

据传他的父亲叫约瑟，是个手艺精湛的木匠，原是大卫王的后裔。家庭声誉很高，品格高尚，然而家境清寒。他不愿出卖灵魂为罗马帝国效劳。约瑟和玛利亚订婚后，还未曾迎娶，玛利亚便感天而怀孕了。基督徒相信这是“道”的化生。

那时，罗马帝国统治着阿拉伯沙漠西经北非到大西洋彼岸，横亘欧洲大森林，直达不列颠岛的广大地区。当时的帝国政府命令全国百姓，包括被征服地区所有被奴役的人民都要回原籍登记户口，于是约瑟便带着新婚的玛利亚从寄居的拿撒勒回伯利恒去办理登记手续。当时人员流动很大，旅栈客满，他们只得寄宿在一处马棚里，恰巧玛利亚临盆了，马槽便成了这个婴儿的摇篮。

婴儿降生的当夜，月光分外明亮，伯利恒的郊野里牧羊人还在辛勤地劳作。他们忽然看见天使站在自己的身边，一圈神奇的光环照亮了四周的大地，牧羊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这时，天使便对他们说：“别害怕，我告诉你们一个特大的喜讯，是所有百姓的喜讯。今天在大卫城里，降生了一位救世主，你们去看，那包着布躺在马槽里的便是圣婴。”这时还有一队天兵在天

空中唱着庄严的赞歌。

不一会儿，东方有 3 位聪明的术士来到城中朝见圣婴，向他奉献了黄金、乳香、没药等贵重的礼物。他们跋涉千里，是因为看见了东方夜空升起的一颗特大特亮的新星，知有圣人出现才来礼拜的。这消息的传布，曾引起伯利恒城的震动。当时，犹太傀儡政权残暴的大希律王听到圣婴降生的传闻后，杀死了城内所有两岁以内的婴儿。然而，约瑟却幸运地带着玛利亚母子逃走了。

耶路撒冷圣殿里有位老圣者，在为婴儿祝福后，曾对玛利亚预言：“这孩子将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倒下，许多人兴起；又要作众矢之的，他自己的心也要被刺透。”

据说耶稣的童年是在拿撒勒度过的。拿撒勒曾是当时世界上最美丽最神秘的地方。那里群山环抱，茂林遍野，溪流交错，喷泉飞溅。满是羊群的草场上，牧歌起伏，花香四溢，景色十分迷人。人杰地灵，这里自然流传着许多关于耶稣童年的传说。

据说，他很小的时候就能领悟大自然的真谛。他看见百合花的迷人能悟出比所罗门的荣华更为可贵的美；看见飞鸟的自由翱翔，立刻想到上帝的慈爱施及世间的造物。在这美丽的大自然中，他常常在精神上与上帝默默沟通。

有一次，他领导一群天真的孩子在屋顶平台上嬉戏，其中一个孩子失足跌落下去跌死。耶稣悲恸地走到尸体旁边，只是叫一声孩子的名字，尸体便复活了。还有的书上说他用一块木头做了只白鸽，一放开手便飞了。

以上都是一些无从稽考的传说，当然不足以令人相信。然而，耶稣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天资聪颖，喜爱读书，勤于思考，悟性过人，却是可以深信不疑的。

关于耶稣的争论

（一）被人格化了的神灵

历史上关于耶稣是神是人的旷日持久的激烈争论，从基督教的产生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一部分学者、宗教家认为，作为历史人物的耶稣是不存在的，耶稣基督只是一种信仰，一种人格化了的虚构的偶像。这是因为通过多年的科学研究证明，圣经中关于耶稣的传说纯系虚构，因而，认为耶稣创立了基督教是一种附会。基督教产生时代的各种著作中很少有人提到基督教和耶稣其人其事。《新约全书·启示录》中所描绘的耶稣基督是一位天神的形象。记载耶稣故事的各种《福音书》多是基督教产生以后很久才问世的。由于刚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不久，基督教内宗派林立，为相互斗争的需要，他们都根据自己的门户之见来编造各种不同的神话。因而各种不同的《福音书》中关于耶稣的生平记载都大相径庭。即使在《马太福音》中，也是前后矛盾，时而说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时而又说他是大卫的子孙。

其实，基督教原本是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 世纪期间，不堪忍受罗马奴隶主剥削和压迫的被征服地区的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当被剥削与被压迫的民族在斗争中屡遭失败、感到自身软弱无力时，就将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神的支配上，以求得精神的解脱。他们殷切地企盼“救世主”的降临。加上当时犹太教只剩下一副干瘪的宗教躯壳，失去了在下层群众中的诱惑力量。这样，带着对死后进入天堂的一线希望，基督教

便在罗马帝国统治区内的劳苦大众中广泛传播开来，成为一个新的教派，最终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

另外，我们从“耶稣”这一同语来考察，它本是犹太人中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有“拯救”的意思，而“基督”则是“救世主”的希腊文音译。实际上两者是同一意义上的宗教用语。当时，在犹太人中曾普遍流传着“救世主”降临人间，救人苦难的传说。人们将心目中幻想的“救世主”称做“耶稣”或“基督”，也是很自然的事。至于传说中的圣诞日期，也是众说不一，无从稽考。以上种种都说明了不是耶稣创造了基督教，更确切地说，而是虔诚的基督教徒给自己创造了一位理想的人格化的偶像。

（二）一个活生生的人

上面谈及的只是争论焦点的一端，另有一些学者则断定耶稣是一个人，一个平凡的人，一个实实在在的宗教领袖。基督教经典中关于耶稣的种种神话传说，诸如“上帝的独生子”、“神人共生”、“死而复活”等都是后人虚拟附会的。

他们说，耶稣的出生地在今巴勒斯坦北部的拿撒勒。父亲名叫约瑟，母亲玛利亚，是约瑟的继室，耶稣是他的独生子，他还有几个妹妹。

当时，罗马的残暴统治激起了犹太人的激烈反抗，而罗马派驻的叙利亚总督却将起义者大批地钉死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现实给童年的他上了生动的一课。

据说耶稣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他少年时期曾多次到耶路撒冷犹太教徒聚集的地区朝圣，从游历中增长了知识，了解了当时的世界。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曾经与犹太教的拉比和文士论辩，他的出众的辩才，使满座皆惊，其实他的宗教修养、学识早已超过一般犹太教士了。

不过，那时的犹太教会，在人民心中，已成为反动、虚伪和腐败的宗教集团。其中只有狂热派能反映人民的愿望，他们主张武装斗争，其中许多人是耶稣的同乡加利利人。狂热派的西门，就是他的12位大弟子之一。应该说，耶稣的思想言行，跟他们是不无瓜葛的。

给予耶稣思想以决定性影响的是约翰。他生活上几乎是苛刻自己，穴居野处，食蝗虫野蜜，在旷野里传道。他神秘地宣称：“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并告诫教徒们：“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耶稣也和其他教徒一样，拥向约翰，在约旦河中接受洗礼。从此他公开传道。以后约翰被希律王之子希律·安迪帕处死了，大家便公认耶稣是约翰的继承人。

耶稣心中充满了仁爱，但他却十分憎恨罗马的统治及其傀儡政权。他揭发法利赛人的残暴虚伪，斥责犹太上层社会的腐败欺诈。

耶稣曾向他的教徒们表白：“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而是叫地上动刀兵。”“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

尽管耶稣传道的时间前后不足两年，然而蒙受苦难的犹太下层人民却把他的言行当做自己生活的希望和福音。

耶稣宣称的“天国近了”的“天国”，实际上也只是一个虚无飘渺的幻影。他说：“上帝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忽而在这里，忽而又在那里。因为它就在你们心里。”他号召建立的新秩序实际上是天翻地覆的变革：“使有权的人失位，卑贱者高升，饥寒者得到饱暖。”他的“天国”说教，实际上是要求将巴勒斯坦从罗马的统治下获得解放，重建繁荣昌

盛的希伯来大卫王国，而他就是王国的继承人。由于他的影响日益扩大，他的教旨日益深入人心，自然引起统治当局的恐慌，于是他以叛逆的罪名被捕了，并被处以钉十字架的极刑。然而，他却永远活在犹太人民的心里。人们思念他，敬仰他，尊奉他为“救世主”，说他是上帝耶和华的独生子，为拯救人类而死，死而复活，40 天后又回归天界。这些神话都反映了人民开创天国的强烈愿望。

争论可以休止吗

2000 年来，耶稣是神是人的争论，可谓热闹非凡。其实，这种争论是永远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的。

历史上的伟人，可以这样认为，无一不被后人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人们难以看清他们的本来面目。

到目前为止，基督教已经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可以这样说，它在世界上的影响已深入到每一个角落。其所占有的地盘，远远超过其他宗教，甚至吸引了很多学者、伟人来崇信它，为它顶礼膜拜。至于耶稣本人到底是基督教徒们塑造的神祇，还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这并不重要。重要的事实是，耶稣是基督教徒普遍崇拜的宗教偶像，看来这一结论是谁也无法动摇的。

形形色色的金字塔

一提到“金字塔”，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埃及的古代文明，因为埃及金字塔是和古埃及文明、古埃及人的高度聪明智慧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也许人们没有想到除了埃及的金字塔以外，在美洲、亚洲、还有许多其他地方都保存了古代的金字塔建筑。

神秘的美洲金字塔

在墨西哥尤卡坦盆地的密林中，在安第斯山地区的平原上，你可以像在尼罗河畔徜徉一样，欣赏到一座座壮丽的金字塔雄姿。它们就是美洲古老文明的象征——美洲金字塔。

美洲金字塔的建造也有长达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从外观上看，埃及金字塔造型规整、巍峨挺拔，而美洲金字塔造型奇特、雄伟壮观。

其中坐落在墨西哥特奥蒂瓦坎城的太阳金字塔，可与埃及的大金字塔相媲美而难分伯仲。它与埃及的金字塔一样，也是由无数规则的有几何图形的巨石砌成。塔高达 64.5 米，基座宽 220 米。其最上层还建有一座神庙，殿堂里供奉着一尊巨大的太阳神像，面向东方。每当日出之际，神像上的嵌金饰银，与天光日色交相辉映，璀璨夺目，十分壮观。

不过，美洲金字塔不是国王的坟墓，而是万民景仰的太阳神庙。有些美洲金字塔里虽然也有墓穴，但是，据考证，这些墓穴都不是与金字塔同时建造的，而是后来从外迁移增设进去的。由于美洲金字塔与埃及金字塔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据此有的学者推断美洲金字塔是埃及金字塔的复制品。有人甚至认为，美洲金字塔的概念都是由古代埃及横渡大西洋的人们带去的，是埃及人到达美洲后才建造起来的。

然而，除了相似之处以外，人们也发现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从外形看，埃及金字塔呈四棱锥形，而美洲金字塔则是四棱台形，顶部还建有太阳神庙；从用途看，前者是法老的陵墓，后者是祭神高台。

据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塔在建筑上根本没有任何渊源关系，进而得出了美洲文明独立发展的结论。当然，他们还举出了一些其他论据。总的说来，他们认为相同之处是一种建筑造型艺术上的巧合。用建筑原理来解释，将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建成金字塔形，无论从埃及人还是美洲人的观念中，都是出于一种稳固性和永恒性的企盼，当然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神秘的美洲金字塔，也像埃及金字塔一样，千百年来，引起了不少学者的研究兴趣。然而，美洲金字塔也有许多难以解开的谜题，诸如建造年代、施工方法、以及与埃及金字塔究竟有无联系等，都有待于后来学者的进一步探讨。

“魔鬼海域”的金字塔

一提起“魔鬼海域”，至今仍令那些有志于航海航天事业的人们惊悸恐惧。从 16 世纪以来，在大西洋的百慕大三角海域，频繁出现船只、飞机的神秘失踪事件。仅在本世纪，美国就有 100 多艘航船、30 多架飞机，连同数千名乘客、船员和飞机机组人员在这里不明不白遇难。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这一海域的汹涌狂涛变得如此恐怖呢？科学家们为解开这个谜进行了长期的研究，提出了许多假说。其中一种假说认为是海底大金字塔造成的。

1979年，由美法等国科学家组成的考察队，在北大西洋西部海域的百慕大群岛三角区进行了海底探测。他们惊讶地发现，在狂涛汹涌的海底，竟耸立着一座巨大的从来无人发现的海底“金字塔”。这座塔的底边为300米，高为200米，塔尖距海面的100多米。就其建筑规格而论，它比胡夫的大金字塔还高大雄伟；论时间，也比它更久远。塔身有两个巨洞，海水以惊人的速度从洞中穿过，卷起狂涛，形成巨大的旋流，从而使这一海域的浪潮汹涌澎湃，海面雾气蒸腾。

然而，上述事实，都令许多人迷惑不解：在波涛翻滚的海底，人们是怎样生存，是怎样施工操作的呢？于是有人认为，这座海底金字塔，可能最早建在陆地上，后来由于发生强烈地震，陆地沉入海洋，这样，金字塔也就沉入海底了。还有人猜测，这座金字塔，可能是远古的阿特兰提斯王国的工匠们建造的。约12000多年前的某一时间，由于地震爆发，使王国突然沉入汪洋大海了。据此，一些学者进一步推断，世界上最早掌握建造金字塔技术的是远古阿特兰提斯人。在该国沉没之前，有些居民迁移到埃及或美洲，是他们带去了建筑金字塔的图样和技术。因此，远古阿特兰提斯王国居民可能是建造埃及金字塔和美洲金字塔的工匠们的共同祖师。但是，另一些学者却根本否认这一说法，认为所谓海底金字塔只不过是一个天然形成的海底巨大的岩石结构，与金字塔形制相似而已。

矗立东方的金字塔

在亚洲东部的文明古国——中国，也有被人们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古代帝王陵墓。它们是山东曲阜的少昊陵、宁夏银川市郊的西夏王陵和吉林集安市的高句丽王陵。这些金字塔造型美观，各具不同的建筑风格，有其不可替代的历史文化价值。

少昊帝陵坐落在山东曲阜城东4公里处。相传少昊是轩辕氏的儿子，已姓，名挚，字青阳，建都穷桑，故号“穷氏”。他后来迁都曲阜，以五行之首的“金”标其政法，“以金德天下”，据说他活了100岁才去世。

少昊陵是后人为纪念这位中华民族的远祖而建造的，始建年代不详。现在人们见到的陵墓是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大修后的作品。陵塔用大石块垒砌而成，石刻、石栏雕琢十分精巧。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将陵墓四周用10000块石块修砌起来，故人们又称它为“万石山”。明、清至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历多次重修扩建，目前陵区总面积已达88000多平方米。除墓塔外，陵区还有成套的附属建筑群。陵台呈四棱覆斗状，表层用平滑的大石条镶砌，下底边长为28.5米，底周长114米，斜坡高15米。设计比例适当，给人以巍峨壮观、庄严雄伟的感觉。塔顶端是周长为35米的平顶，中间偏北立有黄琉璃瓦庙堂，堂内供奉着汉白玉雕少昊像。最令人称奇的是，塔身没有砌筑阶梯，人们只能用双手抠住石面缝隙才能向上攀登。

高句丽王陵坐落在距今吉林集安市4.5公里处的洞沟河畔。这里是曾经延续达600年之久的高句丽王朝的发迹地，保留有数以万计、星罗棋布的古墓葬。约公元前1世纪，高句丽第二代王大米留迁都国内城（今集安市）起，

直到第十九代王广开土止，这里一直是高句丽的王都。史载高句丽民族“俗好厚葬”，所以集安一带至今仍保留如此众多的古墓，是不难理解的。那些用石块筑成的陵墓，高大雄伟，酷似“金”字，故人们也称它们为金字塔。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有太王陵、将军坟。

太王陵是营造工程最大、最浩繁的一座。里面安息的是高句丽第十九代永乐太王谈德。陵墓的外形呈截尖方锥状，边长66米，残高15米，塔身由数级阶梯向上砌叠而成，墓室四壁用修整光滑的石块平砌，上覆一巨石作为顶盖。这座陵墓营建当在公元4世纪末至7世纪初。作为高句丽历史上最强盛时期的统治者，谈德的陵墓自然是最高大最宏伟的。

将军坟是洞沟古墓群金字塔中保存最完好的高句丽第二十代王长寿王的陵墓，俗称“将军坟”，被誉为“东方的金字塔”。长寿王在营建好自己的陵墓后，便将都城迁到了平壤。将军坟是用经过精工琢磨过的巨型花岗石条块垒成，呈截尖方锥体，边长31.58米，共7级，底边各用3块巨石戗护，陵的旁边有扶梯可供游人拾级登临，到达第5级中部即可进入铁门，经甬道进入墓室。墓室内置2组长正方形石棺座，据说当年是停放长寿王及其王后的棺椁的，尸骨早已无影无踪。室内阴风习习、寒气逼人。

宁夏银川西30公里的贺兰山下，有一片巨大的古墓葬群，墓区占地约40平方公里，其中有8座为西夏王陵。每个园陵都是一个单独完整的建筑群体。其规模与河南巩县的宋王陵、北京的明十三陵相似。尽管经过历史岁月的冲洗，人们从现存的遗迹中，仍可看出昔日西夏王陵的宏伟规模和豪华景象。当年鹤台高耸、碑亭矗立、宫殿堂皇、陵台威严，而今最引人注目的只有那座高耸的陵台。它用黄土筑成，拔地而起，高17~20米。这些陵台原为5级或7级，每级构椽覆瓦，配以绿琉璃瓦饰件，外形颇似佛塔。而今表层饰件均已脱落，只留下一座座金字塔状的黄土堆，失去了往日的金碧辉煌和恢宏气势。然而，以金字塔式的陵台为代表的建筑遗迹和精巧的出土文物，仍然令人叹为观止。1988年2月，西夏王陵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了使游客更好地领略王陵当年的风情，国家有关部门在陵区设置了声光装置。入夜，戈壁滩上一片宁寂，五颜六色的探照灯光，将矗立夜空的“巨冢”照得金碧辉煌，旷野传来悲壮的鼓角和兵马的厮杀声，使这千年古墓，显得更加神秘，更加激起人们的游兴。

除此以外，类似金字塔的建筑，还有印度的窣堵坡。随着佛教的盛行，修筑供佛用的建筑物窣堵坡曾在印度盛极一时。窣堵坡最初以砖砌成，其后加以扩大，砌以石块。它是半圆形的房屋建筑，直径约100英尺，顶端为一平台，台上为一方坛，坛上竖立着叠层的伞形柱，这是奉祀佛骨的地方。周围筑环行道路，设置栏杆和大门。

桑奇的大窣堵坡有4个大门，门上都雕饰着以佛教为题材的精美刻品，有很高的艺术和文物价值。

是谁创造了玛雅文化

美洲文明的摇篮

古代玛雅人居住在中美洲地区，即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和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境内。在诸多的印第安部落中，尤以玛雅人的社会发展水平最高，堪称世界古老文明部落之一，它是美洲文明的摇篮。

据地下资料表明，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尤卡坦半岛已经有了人类居住的遗迹。他们以渔猎和采集作为谋生手段，来创造和发展自己的历史。公元前 1000 年左右，他们开始定居，这时，以种植玉蜀黍为主要作物品种的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了。然而这种文化是否为玛雅人所创造，至今仍无定论。公元初，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南部建立了城市，此后的七八百年间，总共建立了 100 多个城市。在城市的广场上他们进行日用品和食品的交流。这时，玛雅人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

公元 10 世纪以后，一支托尔提克人从墨西哥入侵玛雅地区，在尤卡坦半岛上建立起一些新的城邦。自此，玛雅文化便出现了第 2 次的繁荣兴盛。

玛雅人在美洲创造了高度的文化，其全盛时期当在 4~10 世纪。此后玛雅文化遭到了明显的践踏和摧残，只有尤卡坦半岛北部还得以保存和持续发展，直到 15 世纪欧洲殖民者入侵这一地区，玛雅文化的独立发展才被打断。

神奇的玛雅文化遗址

玛雅文化的重要遗址有位于墨西哥中部高原的特奥提华城、尤卡坦半岛南端乌苏乌辛塔河流域的科班城和尤卡坦半岛北部的乌斯马尔城。它们分别属于古典时期、早期和晚期的奴隶制城邦遗址。

通过考古探测，我们知道这些城市的规模宏大，有的城市长宽均达数公里。城内耸立着许多金碧辉煌的神庙和宫殿。在建筑物的墙壁、柱子、梯阶和石碑上有精美的雕刻，有的地方还发现了栩栩动人的壁画，描绘了庆祝游行、呈献贡赋、押送战俘、争夺格斗等场面，表现了玛雅人高度的艺术成就。除此以外，多层次的金字塔台庙建筑，光怪神奇，令人赞叹。如乌斯马尔城的几座多层次金字塔，反映了玛雅人对地球的原始观念。他们将地球上部分成若干层，每层有 13 个世界；地球下部也是如此，每层有 9 个世界。各层分别由“界神”掌管。

玛雅人信仰太阳神、月神、蛇神、风神、雨神、地神和农神，尤以崇拜玉米神为最。他们用占卜沟通人与神的联系。玛雅人祭神的规模很大，祭品除牲畜、飞禽、瓜果外，还一度盛行人祭。

公元前后，玛雅人便有了象形文字，包括许多象形符号和音标、音节符号，它们一般用小毛笔书写在无花果树皮上。科班城建筑群中著名的“象形文字梯道”，是玛雅人特有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然而，遗留到今天的玛雅文字，多是镌刻在石碑、陶器、骨器上的铭文，而且迄今无法辨认。

是谁创造了玛雅文化

玛雅人创造的太阳历法，规定每年为 365.2420 天，而现在天文学家的准

确计算是 365.2422 天。一年的误差不过是 0.0002 天，这种精确度恐怕很难用巧合来解释。

此外，令人更加迷惑不解的是，在洪都拉斯一座神庙的壁画中，人们发现画面中有玛雅人乘坐一种类似今天火箭的飞行工具遨游太空的形象。人们相信，艺术的夸张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断定，玛雅人已早于我们几千年提前进入了太空时代呢？如前所述，玛雅人具有超时代的天文科学知识，他们创造的太阳历比格列高利历更准确，更贴近回归年长度。从现有的文字手稿中，人们还知道有玛雅人预测数十万年间日食、月食的表格和标明流星陨石坠落的时间表。这些事实表明，玛雅人的智慧已超越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特定历史时代。

据此，有的学者提出，是外星人创造了玛雅文化，玛雅人的祖先原本就是进入地球的外星人。另一些学者则从玛雅文化与亚洲古代文化的历史渊源，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通过两种文化的对比研究，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人类学家发现，印第安人的肤色和体形与亚洲蒙古利亚人种相似，因而一般认为他们属蒙古人种。

有人考证，古印度著名史诗《摩诃婆罗多》曾有过“地球另一隅的人”的记载，这些人可能就是进入美洲的亚洲人。这些人进入美洲后，在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洪都拉斯经过长期的发展，虽然逐渐形成了与印度各自不同的文化体系，但是，他们却有着大致相同的神祇和信仰，如对日神、月神、蛇神、风神、雨神、海神、地神的信仰等即是有力的佐证。印度古代的大佛塔“窣堵坡”与墨西哥等地的大型金字塔台庙形象十分相似，这也是很难用巧合来加以解释的。

基于上述理由，有人便提出亚洲人是玛雅文化的创造者之一。

由于美洲没有发现远古人类生活的遗迹，美洲人种究竟来自何方的问题，多少年来，学者们一直众说纷纭。近年来一般认为，印第安人是从亚洲东北部移居美洲的，属于蒙古人种的一支。也有人认为，有一部分印第安人属澳大利亚——美拉尼亚人种，是与蒙古人种的一支同时或更早移入美洲的澳洲人。

据测定，他们移居美洲的时间约在四五万年以前。其迁移动机或者由于追踪野兽，或者因为气候突变。为了生存，他们从亚洲出发，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前进，越过白令地峡（最近一次冰河时期，当时的白令海峡比今天约低 100 米）抵达美洲大陆。后来海面升高，地峡变成海峡，迁移的人便踏着海峡的坚冰，或是沿海边航行进入美洲。不过，这种移民，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渐进过程，决不是一次两次的挺进行动所能完成的。

上述种种观点，孰是孰非，还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轻率的结论只能是科学探索领域的最大误区。

巴枯宁《忏悔书》揭秘

19世纪30年代，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的巴枯宁（1814—1876），被卷入了正在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成为鼎鼎大名的政治投机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思想家，并进而堕落成为破产小生产者的政治代表。他混迹于无产阶级运动中，在斗争中不时向沙皇进行暗探式的告密；在斗争的严酷时刻，更心甘情愿地接受沙皇的收买。对于他的种种叛徒行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早有怀疑，但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掌握充分的证据，因此只能在《社会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一书中，清算巴枯宁在第一国际中的反革命活动，揭示他历史上的许多疑点。书中曾借用《哨兵报》的话说：“即使你不是被收买的暗探，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无论哪一个被收买的暗探也不能比您造成更大的危害。”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也只能从他的行为对革命所起的破坏作用方面进行批判。

然而，巴枯宁是否是货真价实的革命叛徒，直到他去世45年后，即1921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才从沙俄政府第三厅的档案中，查到了巴枯宁亲笔撰写的《忏悔书》，巴枯宁是否叛徒的历史之谜才被解开。人们这才看清了当年这位混迹革命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原来是匍伏于沙皇脚下的无耻叛徒。

虔诚的感恩戴德

巴枯宁于1849年5月10日，在萨克森的德累斯起义中，因失败而被捕，1851年引渡回国，被沙皇囚禁在彼得——保罗要塞监狱。6月28日，沙皇尼古拉一世为了瓦解革命力量，派奥尔洛夫伯爵到监狱劝降。在这生死考验的关键时刻，巴枯宁终于低下了高傲的头颅。他同意“毫不羞耻地采取灵活的方式”，写一份虔诚的《忏悔书》。通过长期的精心创作，他果真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一份长达10万言的叛徒自白书出笼了。

在《忏悔书》的开头，他虔诚地向沙皇表示悔罪，并乞求怜悯和宽恕。他说：“……陛下啊！我不配得到这种宽恕，我一想起过去妄自评议皇帝陛下时，就感到惭愧……”

“……因此，我祈求上帝提示我以纯朴、真挚、诚恳和毫无矫揉造作的话语，使我能博得皇帝陛下的怜悯。”

卑鄙的献媚取宠

自称为“俄国志士”、与沙皇不共戴天的巴枯宁，在谈到他之所以低头认罪、痛改前非时，竟称自己的政敌为“慈父”，自己是受了慈父般皇恩的感召和受到俄国现实的教育后才下决心这样做的。他说：“陛下，我无法表达，在我刚进入俄国国境时（指引渡回国时）受到的那种高尚的、人道的、宽宏大量的待遇时……，如何深受感动！我原先预期的是另一种接待，我的所见所闻和从波兰王国到彼得——保罗要塞的途中所经历到的一切，都与我的担忧绝然相反。”他还说自己“所说所写的有关俄国政府的残暴”是“谣传”，“使我第一次对自己过去的想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并痛骂自己过去是在“进行诽谤”，彻底认识到“许多旧的偏见都是站不住脚的”。

为了表示他认罪的诚意，他发誓：“在这份忏悔书中对您决未隐瞒一个错误、一桩罪行。”他声称自己已经“把整个灵魂向您和盘托出”。

痛心疾首求活命

巴枯宁在他的《忏悔书》中，把他过去的反对沙皇的言行，说成是一种“罪孽”。他说“您已经看到我的种种错误，看到我如何一错再错”，他还将自己犯罪的过程写成一个公式：“由错误而铸成过失，由过失而演变为罪孽。”

他痛心疾首地向沙皇忏悔：“总而言之，我明白，我个人的意图和行为都是极其荒唐可笑和粗暴犯罪的。”他坦诚地指出，自己的所有罪行都是“反对我的陛下，您；……反对我的祖国俄罗斯；……反对一切政治的和道义的、宗教的和人道的法则！”

“我内心深处充分意识到，最主要的，我是反对您，陛下的罪犯，是反对俄罗斯的罪犯。我的罪行理应处以极刑。”他还用了许多十恶不赦的词语来咒骂自己，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乞求皇上饶恕他，留下一条性命，以期在人世上苟延残喘。

向沙皇提供情报

作为欧洲宪兵“总督”的沙皇尼古拉一世，之所以让他活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想从他的口里和笔下掏出特务机关从未获得且今后也不可能获得的大量有关革命的核心机密。而巴枯宁强烈的求生欲望，又恰巧与尼古拉的想法相吻合。各取所需，于是，一笔政治交易自然很快地成交了。

在《忏悔书》中，巴枯宁向沙皇报告了俄国、波兰、捷克、匈牙利、乌克兰、奥地利、法国、德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家和地区革命民主派的政治思潮、组织形式和活动特点，泄露出欧洲各革命派别和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法兰克福议会、斯拉夫人大会的内部情况和存在的内部矛盾。他还详细地叙述了1848～1849年欧洲各国革命的具体过程。由于他对沙皇的赤胆虔诚与“和盘托出”，他的《忏悔书》得到了尼古拉一世的高度评价，他曾别有用心地批转给自己的儿子阅读。批语是：“值得一读，非常有趣，颇有教益。”

共产运动的敌人

巴枯宁在《忏悔书》中承认自己在法、德、比、英等许多国家结识过不少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读过和研究过他们的著作和理论，但是他申明：“本人从来不属于这类宗派、这类团体，而且与他们的事业，与他们的宣传活动毫无关系”。他认为：“东方无论哪一块斯拉夫人的土地上——也许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部分地区除外，共产主义既无地位，也无意义。”他进一步诬蔑地说：“公开的共产主义团体的软弱性，1848年在英国、法国、比利时，尤其是在德国明显地表现出来。”除此以外，他还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胡说什么“要在现时每种著名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寻找荒诞无稽、自相矛盾、以及无法实现的东西，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因此，没有哪一种现存的社会主义理论能够维持哪怕3天。”为此，他断然宣布与

共产主义划清界限。

矛头直指马克思

为了博取沙皇的怜悯和欢心，他申明自己与共产主义者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并将罪恶的矛头直指科学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导师马克思。在《忏悔书》中，他既承认自己曾参加过“一个由德国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联合组成的团体”，在谈到后来和他们中断联系的原因时，却声称自己“不喜欢他们的作风和腔调，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因而引起那些共产主义的人们的不满，甚至仇视”。还说他们对自己变节行为的批评“嗓门拉得比别人高”，特别是布鲁塞尔的德国共产主义的领导人马克思，“由于我不愿意做他们团体的勉强的客人，就比别人对我更加深恶痛绝”。他还指责马克思在他主编的《新莱茵报》上对他“加以责难，似乎我以告密毁了许多波兰人”。由于《新莱茵报》在民主派和工人中的巨大影响，造成了“所有的人突然间到处大谈我的虚伪和叛卖行径”。

为沙皇出谋划策

1848年，波兰和德国的革命者联合起来，准备在波兹南发动反对沙皇统治的起义。听到这一消息后，巴枯宁立即从巴黎赶去，准备抵制起义的发动。在旅途中，当有人问及他是否参加这次联合行动时，巴枯宁斩钉截铁地说“绝对不行！”并狂妄地表示：“德国人只要敢于在斯拉夫土地上踏一只脚，我立刻就把他们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他声称自己的波兹南之行是“竭尽全力反对德国人和波兰人那种不自然的反俄联合”。

作为一个泛斯拉夫主义者，他甘愿匍伏在沙皇的脚下，恬不知耻地表示自己“深深地、深深地崇拜着圣上”！他出谋划策，建议沙皇去扮演斯拉夫民族“救世主”的角色，并坚信，只要沙皇愿意举起斯拉夫人的旗帜，这些民族就一定会“盲从您的意志”，即使是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区所有讲斯拉夫语言的人，他们也会“愉快地、欣喜地投入俄罗斯之鹰的巨翼”。他还预料，沙皇的铁蹄将会“势不可挡地冲向万恶的德国人，而且冲向整个欧洲”。

不用赘述了。《忏悔书》的问世像一把钥匙，解开了一个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历史之谜：巴枯宁到底是人是鬼，是革命家，还是无耻的叛徒，人们自然会作出公正的判断。还应该指出的是，当巴枯宁写完了《忏悔书》后，在政治上便完全投靠了沙皇。从以后的所作所为看，他确实没有辜负主子的宠爱与厚望。在他重新混入第一国际后，继续扮演着假革命、真内奸的卑鄙角色，起着沙皇特务所起不到的破坏革命的作用。

隆美尔死因的疑案

历史的真相往往被一层令人烦恼的迷雾笼罩着。它使很多好人蒙受冤屈，也使许多恶人误享殊荣。

纳粹德国陆军元帅隆美尔被赐自尽后，很多人便据此给他戴上了一顶迷人的桂冠，称赞他是反希特勒的英雄。然而，历史的真相果然如此吗？

希特勒的一员骁将

被誉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原系普鲁士陆军军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到 1933 年希特勒上台期间，他先后担任过驻斯图加特某步兵团射击连连长和德累斯登步兵学校教官。他以忠诚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上司的青睐而逐步升迁。

希特勒上台后，隆美尔受到特殊的宠信，曾多年负责他的安全与保卫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被委以独当一面的重任。这位被宠信的将军也确实没有辜负主子的厚望。1940 年初，他担任第七装甲师师长，奉命入侵法国，击退英法联军，直抵英吉利海峡。他后又率军恢复北非局势，先后荣获铁十字勋章和栎树叶铁十字勋章。在北非广阔无垠的大沙漠上，他以较少的兵力与英美联军周旋，他机智果断，神出鬼没，避实就虚，英勇善战，创造了许多举世闻名的成功战例，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他为希特勒立下了赫赫战功。这期间隆美尔平步青云，一跃成为纳粹德国最年轻的陆军元帅。1942 年初，他再次进攻，直抵尼罗河三角洲，进入到离亚历山大港只有 70 公里之遥的阿拉曼地区。

然而，海潮也有退落的时候，人的一生自然也是这样。这位显赫一时的传奇式将军却在大战结束前的几个月，惨死在曾经百倍宠信过他的希特勒手上。这个不曾预料的结局，自然又给他的一生蒙上了一层悲壮而又神秘的色彩。

他扮演了什么角色

最终将他送上西天的是“七·二”事件。这还得从头说起。1943 年，苏德战场上，德军屡遭失败，西线盟军实力增强。然而一意孤行的希特勒不顾前线将士的安危，以严厉的军令，禁止任何撤退或突围，盲目冒进和固守，使将士伤亡惨重。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在西线苦苦挣扎的隆美尔不得不从埃及撤退。为了阐明自己的主张，隆美尔亲自飞往希特勒的最高统帅部，以精辟的见解劝告希特勒放弃北非，然而遭到了怒斥。非洲失守后，希特勒任命他为西线 B 集团军司令。这时，盟军利用掌握在手中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对西线德军展开了立体攻势，隆美尔请求增援，又多次遭到希特勒的奚落与斥责。灰心与失望，开始笼罩在他的心头。他对最高统帅的冒进战略与独断专行的作风产生了严重的不满情绪。

这时，军内情绪波动，密谋活动时有发生。1944 年 2 月，隆美尔回国渡假期间，反希特勒的密谋者施特罗林曾与他接触。回到前线后，他们又试图通过新任参谋长斯派达尔谋求隆美尔的支持。1944 年 6 月 6 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这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德军的末日已将来临，根本无力保住

大西洋漫长的海岸防线。他又一次恳切地向希特勒痛陈利弊，要求结束西线战争，并在7月15日给他发出了最后信件。这时，他已拿定主意，准备在法国与盟军单独媾和。

7月17日，隆美尔在乘车途中，遭到了盟军飞机的袭击，受了重伤，被送往医院抢救。在治疗期间，震惊世界的“七·二”谋杀希特勒的事件发生了。对这次事件，隆美尔没有表示过赞同。他说：“谋杀希特勒的企图实在毫无意义。我们怕的不是这个人的作为，而是他个人在德国人民眼中所显示出来的偶像地位。”他的妻子和儿子在战后都发表过声明，否认隆美尔参加过这次谋杀事件。

隆美尔到底在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从上述事实中自然可想见一斑。

是屈死鬼，还是英雄

“七·二”谋杀事件，使希特勒差一点命丧黄泉。他的秘密警察在“七月阴谋”后的清洗中牵涉到了隆美尔。一般看来，问题已经很清楚。深入地研究，也不过是他与谋反集团合作的程度问题。据此，一些历史学家、传记作者都顺理成章地将他描绘成反希特勒的英雄。有些书中，把他说成是谋杀集团的成员，并有他们合作的详细描绘。数次再版的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中也确认了隆美尔与谋杀集团的合作，还说谋反集团打算在希特勒之后，推选隆美尔为政府首脑。

然而，在斯奈德的《第三帝国百科全书》的一篇文章中说：在1944年6月17日和29日，隆美尔两次见希特勒并想说服他结束战争，这样德国还可以保留相当可观的军事实力，但这位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的元首用愤怒和讽刺来回答他的坦诚。1944年7月，也就是盟军诺曼底登陆后，英军飞机击中他的汽车，他身负重伤，被送回家乡尤姆养病。这时，隆美尔日渐觉悟……这个坦率、单纯的军人，开始转向政治，他反对计划中对希特勒的谋杀，因为这会使希特勒成为英雄……隆美尔从未在“七月阴谋”中担任积极角色。

看来，谋反分子内定在行动成功后由他担任政府首脑，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厢情愿。谋杀失败后，一个谋反分子在处决之前被希特勒的秘密警察挂在一个吊肉的钩子上，在极度痛苦之际，他将隆美尔扯进谋反分子的名单中，是不足为奇的。这也许就是他厄运的根源。

1977年，英国传记作家大卫·欧文在他的《狐狸的审判》一书中，发表了虽与上述观点略同，然而又肯定得多的论断。他认为，隆美尔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自始至终忠于他的元首希特勒，从未参加过谋反活动。他虽和阴谋分子有过交往，但反对谋杀希特勒。他认为，日暮途穷的他，还能在政治上找到一条生路；他并不知道他的同事中有人参加了谋反活动；隆美尔的死是由于被捕的谋反分子有意供出一些效忠希特勒的元帅，为真正的同谋打掩护。为此，大卫·欧文还引证隆美尔夫人1945年9月发表的对她丈夫曾参加谋反集团进行否定的声明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的作品问世后，立即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反驳得最起劲的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原隆美尔部队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证明：隆美尔不仅发表过结束战争的言论，而且要推翻纳粹政权。因此，他声称隆美尔是属于谋反集团的成员。

不过，仔细想起来，欧文的观点也并非证据十足。如果说隆美尔缺乏政

治头脑，是一个只知道效忠元首的“单纯的军人”，又怎能想到在激战之际与西方盟国签定停战协定，以便在东方战线开辟新的局面？为什么他与谋反分子接触交流后，不将情况向他效忠的主子报告呢？所以要证明他没有参加谋反活动，理由还显得不够充分。

另外，如果说隆美尔之死是谋反分子苦打成招的结果，那么，希特勒又怎么会如此轻信呢？隆美尔多年效忠希特勒，而且战功显赫，甚至赐死以后，还得装模作样地给予他国葬的殊荣。据此，我们能说希特勒轻信胡编的供词，而错杀了他吗？

不过，将各种说法进行比较研究后，接近真实的结论应该是隆美尔在战争形势发生急转的情况下，产生了比较成熟的、企图挽回败局的战略设想，当遭到希特勒的斥责与奚落后，由失望而引发对元首的不满甚至怨恨，而在另一些完全不同的问题上与反希特勒集团也有分歧。由于暗杀行动的失败，隆美尔受到牵连被逼自杀。他的死，只能说成是他个人的“悲剧”，至于到底是屈死鬼，还是反希特勒的英雄，这两顶帽子戴在他的头上看起来都不怎么合适，特别是后者。

墨索里尼的人生轨迹

“正义没有武力是无能，武力没有正义是暴政。”这是法国巴斯卡的一句名言。

墨索里尼依靠武力起家，然而毁灭他的最终还是武力。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缺少“正义”，用自己的武力去屠杀人民，去发动灭绝人性的侵略战争。

从投机发迹到倒台

从1901年到1912年，在这短短的11年里，墨索里尼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学教师，一跃成为意大利社会党左翼多数派的领袖、工人运动中的头面人物。

但是，这位政治上的投机商、冒牌的社会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快暴露出其社会沙文主义的狰狞面目，投靠了大资产阶级，成为他们的忠实奴仆和代理人。他疯狂地叫嚣用“血浴”的手段改造意大利社会，鼓吹意大利应站在协约国一边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与其同伙组成了“参战同盟”。这些违背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叛逆行为，遭到了社会党人的坚决抵制。他被清除出党后，于1919年3月，在米兰组织了一个法西斯团体“黑衫党”。这个法西斯战士团以革命的面目出现，提出了自己的纲领，如“实行平等选举”、“保证八小时工作”、“对资本课税”、“没收教会财产”、“取消常备军”等。这些欺骗性的口号，对群众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此，受到垄断资产阶级的器重和保守派的支持。其成员最初只有150名，多为退伍军人。他们狂妄地宣称：“这些从前线活着回来的人，要求取得统治意大利的权力”，并扬言要用暴力粉碎“赤色分子”的恐怖，建立法西斯专政。在当时的背景下，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运动就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开来。1921年11月，法西斯党正式成立，接着又建立了“国民工会”。他的组织由一个松散的运动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化的有严格纪律约束的政党。1922年，法西斯党先后控制了波伦亚和米兰市政府，并迫使64个地方议会解散。10月，墨索里尼在那布勒斯法西斯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了向罗马进军的总动员令。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抵抗，墨索里尼就迫使国王任命他为意大利政府总理。11月15日，国王又授予他独裁的权力。墨索里尼轻而易举地夺取了“元首”的桂冠。

一步登天的他，对内推行法西斯恐怖政策，逐步取消了除法西斯政党以外的一切政治团体，血腥地镇压共产党和工会的进步活动；对外则执行赤裸裸的侵略方针。1923年8月，墨索里尼的军队占领科孚岛，9月占领阜姆，同时在利比亚和索马里进行镇压民族解放的战争。

由于意大利资本主义的脆弱与阶级矛盾的尖锐，用刺刀与鲜血造成的局部稳定也是很短暂的，到1926—1927年间，经济危机又笼罩了全国。这期间，意大利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从未停止。1924年的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获得了很多席位，取得了可喜的胜利。这表明了法西斯统治基础的脆弱。

就在国内各种矛盾尖锐发展的同时，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1937年11月，意大利又加入了德日发起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从而在国际舞台上正式形成了以“柏林——罗马——东京”为轴心的侵略集团。从此墨索里尼便

将意大利国家的命运绑在了德国法西斯的战车上。他的矛头直指非洲，妄图用战争取得地中海一带的霸权。

然而，战争的胜券并未稳操在墨索里尼的手中，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侵略战争的惨败，使意大利再次陷入崩溃的深渊。1943年7月，英美联军在西西里登陆，德意军队被逐出非洲后，国内民怨沸腾，统治集团内部分崩离析。其中陆军元帅巴多格利奥、外交部长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等一批法西斯的中坚人物和国王本人，都在暗中策划推翻墨索里尼的统治。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1943年7月25日，一条震惊世界的消息传开，意大利法西斯党魁、独裁者墨索里尼的统治在一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中被推翻了。这一事件发生得如此迅速，又如此彻底，几乎令他的敌人和朋友都感到迷惑不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最根本的原因是他追随纳粹德国发动侵略战争，把意大利国家引向了绝路。战争，耗尽了人民的膏血；战争，毁灭了人们的家庭。非洲战场的惨败，使意大利在那里的殖民地连同其远征军一起化为乌有。于是，人们把一切罪责归咎于执意参战的墨索里尼身上。于是，在一片民怨沸腾声中，他的同伙决定走马换将，把这个权倾朝野的独裁者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妄图挽回意大利已经形成的败局。

不过，推翻墨索里尼的具体详情，至今还留下了一些令人不解的疑团。

学者们的种种推测

几十年来，为解开墨索里尼倒台所留下的历史疑团，众多的学者为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开展了热烈的讨论。他们探索的焦点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策划并组织了这次政变？第二个问题：格兰迪动议通过后，墨索里尼为什么没有采取反击行动，而是驯服地束手被擒？

争论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仍然众说纷纭，各执己见。

第一个问题，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一些观点：有人认为运动的实际发动者是他的党内的一批“老战友”。他们通过1943年7月24日召开的中断了4年的大法西斯委员会复会的时机，设法使法西斯元老、前外交大臣格兰迪抛出的一项关于墨索里尼必须把一切权力，特别是军队的统帅权力移交给国王的动议获得通过，从而为国王解除他的职务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和胆量。持这种意见的是英国学者赫德和韦利。

也有人认为国王和军队在推翻墨索里尼的政变中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大法西斯委员会并未作出解除他的职务和拘捕他的决议。这一切都是国王和军队干的。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意大利的三股政治力量——即大法西斯委员会、军队和国王，事先早有预谋，政变的发动，只是这种预谋的按部就班的实现。缺少哪一个环节，都会造成运动的中途夭折和失败。不过，比较起来，军队和国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不能否定大法西斯委员会的紧密配合。英国首相邱吉尔即持这种观点。

反对的意见则把这种现象看成是三股力量在发动时间上的“偶合”，而不是事先的预谋、串通和结合。

然而，如果真是这样，有些现象将无法解释。7月24日，大法西斯委员

会开幕后，为什么守卫威尼斯的墨索里尼的私人卫队，早被由军方控制的国家军事警察所取代了呢？为什么新政府首脑的任命宣布后，格兰迪等法西斯委员会成员会马上向新总理致贺呢？

从上述现象中，不难看出，如果事先未能达成某种秘密协议，政变过程中接连采取的一连串措施，决不可能配合得如此默契、巧妙。

第二个问题，学者们大致有两种看法。第一种意见认为，墨索里尼此时已经心力交瘁，会议进行中，又患了腹痛病。在委员会激烈辩论时，他几乎连起身表示反对的力气都没有了。除此以外，他的判断能力已受到了极大的损害，竟觉察不出事态发展的严重程度。这一点，他在后来的回忆中作了似是而非的解释，推说他当时的意志受阻，对政变的发展无力回天。第二种意见认为，墨索里尼此时也许看到了形势的急剧恶化，意大利已经根本无力支持战争。为摆脱希特勒的控制，只有借口法西斯党内反对他的政策，为自己退出战争找到一个合法的理由。25日会议结束后，他接见了日本驻罗马大使，谈话中便流露出了停止战争的意向。

但也有人对上述理由提出异议。尽管墨索里尼身体患病，也不会严重到连下令反击的力气也没有。显然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上，25日上午，他照常视事，还视察了遭盟军空袭后的城区。墨索里尼之所以镇定自若、毫不反抗，其主要原因是相信一贯坚决支持法西斯运动的国王。国王曾经给予他独裁的权力，现在不会因为某些人的反对而收回自己的成命。然而，他绝没有想到，一个包括国王在内的三股力量早已密谋结合，会上出现的事情，只是这次精彩演出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好戏还在后头。

除此以外，墨索里尼也许对自己的实力和威信仍坚信不疑。他认为，大委员会的一纸动议“其奈我何”？因为中下层法西斯党徒和法西斯民团仍然会效忠于他。其实，此时的墨索里尼早已成了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连由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女婿齐诺亚也成了他的政敌。事实上，当政变发生后，那些曾宣誓为之效死的法西斯党徒，没有一个人拿起武器组织过任何有实际意义的反抗。

玩火者必自焚，墨索里尼最终以自己的悬尸街头，应验了这一毋庸置疑的真理。

尽管在他倒台和被捕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史学界目前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这些都妨碍人们对墨索里尼其人其事的了解，也不妨碍他作为一本反面教材的历史价值。

希特勒自杀之谜

中国有句古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时间一到，一定要报。”

恶贯满盈的德国纳粹头子的死期临近了。苏联人争分夺秒地压缩着围困柏林的包围圈。前线告急的战报雪片般地飞向德国总理府距地面 50 英尺的元首地下指挥部。众叛亲离的希特勒，此时不得不开始处理他的后事了。

死神威逼下的婚礼

1945 年 4 月 20 日，希特勒凄凉地度过了他 56 岁的生辰庆典。这次祝寿的气氛自然不能和往昔相提并论。这时的总理府已是断瓦颓垣，一片狼藉，布满弹坑的地上，到处都是大理石碎块、水晶吊灯的渣片、以及七零八落的破烂家具，沉甸甸的大门早已倒塌。只有一间房子未遭破坏，那就是希特勒柏林守军的司令部。

祝寿庆典后两天，即 4 月 22 日下午，希特勒在一次特别会议上宣布了他决心留在柏林的消息。他的这一决定，也许是对他的部下违抗军令，私下与“敌人”谈判以求自保的叛变行为的回击。

不久，希特勒向他的忠实侍卫格林交待了后事。他温和地对他说：“我有一事相托，过去我总是命令被围困的指挥官拼死抵抗，今天我不收回成命。这项命令对我同样有效。你去准备两条羊毛毯子，并把足够焚烧两具尸体的汽油放到我卧室里。我和爱娃·勃劳恩将在此自尽。你用羊毛毯裹起尸体，抬到上面花园里焚烧。”

4 月 29~30 日夜晚，柏林市政府参议员瓦格纳冒着枪林弹雨，在大炮的轰鸣声中，被召到总理府主持婚礼。希特勒早就命令把通常举行军事会议的地图室布置成了婚礼厅。在桌子边为他们夫妇以及两位证婚人戈培尔和鲍曼准备了 4 把椅子。元首的婚礼不像通常人们想象的那样豪华热闹，参加典礼的来宾寥寥无几，场面显得十分凄凉，然而又很肃穆。

婚礼上，爱娃的神情显得有点激动，瓦格纳手里拿着两页用打字机打印的表格，表内写明了新婚夫妇是雅利安人，没有遗传病，彼此愿意结为夫妇。

仪式完毕后，希特勒、爱娃接受了来宾的祝福。凌晨 1 点 30 分，新婚夫妇退席。他的身边人员以来宾的身份接受了主人赐予的一次简朴的婚宴，气氛与当时的军事形势极为相称。

至于希特勒为什么在临死前还要举行这次婚礼，从 4 月 29 日他写下的私人遗嘱中可以找到答案。他说：“在战争年代里，我不能负起组织家庭的责任，现在决定在我生命行将结束之前，娶这位年轻姑娘为妻。她数年如一日地忠于友谊，并自愿来到这个几乎被包围的城市与我同生共死。她将作为我的妻子一同死去。”

爱娃婚后的态度十分镇静，她以与希特勒的结婚而感到莫大的幸福，似乎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视而不见，对面临的凄凉境遇无动于衷。

魔鬼洞穴里的枪声

4 月 30 日清晨，希特勒的房门便洞开了。这时，他的亲信们有的还在沙

发上打盹，有的则斜躺在候见室的床垫上。已经突破城防，进入柏林市区的苏联红军士兵随时都可能出现在地下室的入口。

希特勒到电话间，给前线司令挂了电话，传来的信息是：“防线已经全面崩溃，俄国人的包围很难突破，依靠援军无望。”

在这紧急关头，希特勒拒绝了乘一辆装甲车在 200 多名青年团团员的护卫下突围的建议。

早餐后，希特勒和爱娃分别向对他们忠心耿耿、矢志不渝的侍从和亲信一一诀别。他弯下腰，额上依然搭拉着一绺头发，然而，头发已经变得灰白了。

他以镇定的语调对待卫说：“我将自尽，你知道你该做什么。我已命令其他人杀出地下室，你加入其中一组，向西突围。”接着，他走近侍卫，伸出手来，一生中最后一次行了一个德国式的军礼。然后，他径直走向了自己的办公室，掩上了房门。

不久，一声沉闷的枪响，侍卫们立刻嗅到了一股浓烈的火药味。大家知道，预料中的事情发生了。他们迅速推门而入，只见沙发上躺着两具刚刚毙命的尸体。希特勒用一支 7.65 口径的手枪往右太阳穴上开了一枪。这一支枪和另一支备用的 6.35 口径的手枪都落在他的脚边，他的脑袋稍稍偏向墙壁，鲜血流淌在沙发边的地毯上。爱娃的尸体紧挨在他的右边，双脚蜷缩在沙发上，肌肉抽搐的面孔，说明她服了氰化钾。毒药渗出的痕迹在她匀称、灰白的脸庞上显而易见。装毒药的匣子还放在桌子上。

事后，希特勒的贴身侍卫格林，遵照他临终前的嘱咐，将两具尸体裹在羊毛毯内，抬到总理府花园地下室门口不远的的一个炮弹坑内，并排放着，然后淋上汽油，将点燃的新闻纸卷扔在浸透汽油的尸体上，熊熊的烈火顿时燃烧起来。

这当儿，苏联红军打出的炮弹，正在花园四周猛烈爆炸，为这位元首的葬礼增加了一层悲剧的色彩。

希特勒尸骨的下落

长期以来，希特勒尸骨的下落，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后来苏联人说他的尸体被人烧掉了。至于他的遗骨到底埋葬在什么地方，至今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谜。

1945 年 4 月 30 日希特勒自杀后，5 月 2 日，苏联情报部的克利缅科中校当即跟随苏联红军一道来到了希特勒的地下指挥部。那些被俘的纳粹分子声称，他们在一个炮弹坑里焚毁了希特勒的尸体并将残余的骨头分散扔掉了。这就是 40 多年来的正式说法。直到 8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向两名美国电影导演公开了过去的一些电影档案资料后，才改变了这种说法。这两名美国导演在放映第 29 号盒里的资料影片时，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场面：一些红军士兵来到了希特勒指挥部的大院里，在他们的脚旁躺着阿道夫·希特勒，或者是一个酷似希特勒的人的尸体，额头正中有一个枪洞。

消息传开后，记者们兴致勃勃地进行了调查。他们在乌克兰找到了一名前情报部的官员，名叫奥尔洛夫斯基。他谈及的情况是：克利缅科中校是在 5 月 4 日才在一个炮弹坑里发现希特勒和爱娃的被烧焦的尸体的，旁边还有一条他最心爱的狗的尸体。由于斯大林对希特勒是否真正自杀表示怀疑，所

以必须对尸体进行必要的科学检测。尸体首先被运进了一座监狱，经德国海军少将埃里希·福斯确认后，又将其运到巴赫的一家医院进行了解剖。希特勒的私人牙医的助手再一次确认尸体的真实性后，斯大林才部分地放了心。

其实，苏联人并没有烧掉这两具尸体，而是将其埋在医院附近不远的地方。后来，为了避免有人盗挖，情报人员接到了重新埋葬尸体的命令。于是，又将其移葬在拉特诺附近。当时，苏联的情报机构就设在这里。几天以后，情报机构的总部转移到了马格德堡，希特勒和爱娃的尸骨又被带到了这座城镇。

80年代末，当时在情报机构秘书处任职的捷列先科公开了一些秘密材料。一份被列为绝密的文件记载：希特勒和爱娃的骸骨被从拉特诺附近的森林中挖出之后运到了马格德堡，在一天夜晚，被埋到了一间库房的地下，随后，苏联人又在地面铺上了沥青。

这很可能是奥尔·冯·格里舍尔挖掘的那间仓库。然而，人们发现这个地方与苏联情报人员透露的地点稍有不同，而且不是两具而是32具骸骨。至于希特勒和爱娃的骸骨，据苏联情报人员称，是埋在一个油沟里，地面上牢固地铺上了沥青。

为了解开这个历史之谜，德国当局决定继续挖掘，然而又十分担心由于尸骨的出土，会引起一些本可避免的政治麻烦，因为希特勒至今仍是那些极端分子的偶像。

